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問題與討論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doi:10.6752/JCS.201503_(20).0016

文化研究, (20),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2015

作者/Author: 柄谷行人

頁數/Page: 252-25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問題與討論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柄谷行人等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將會降臨的新的交換模式，柄谷行人說像是被壓抑者的回歸，是一種必然的、強迫式的回歸。我們可以繼續問，上述的回歸是如何可能發生？如何可能發生在所謂的小型共同體，或者是無支配性的、自由和平等的區域性的交換模式？不過這些問題我們先暫緩，我們先聽一下在場聽眾的問題。

郭彥伯（交通大學社文所碩二）：

大家好，我是社文所碩士班二年級的郭彥伯。我在三月運動發生期間，每周到現場三、四天，一些非常親密的朋友也在立法院議場內參與整個行動。我這次運動有一些觀察和分析，希望能提出來回應柄谷先生。

在三月的占領運動發生以後，台灣有不少學者寫文章讚許「學生」，他們把這場運動跟台灣在1990年發生，被稱之為野百合的學運做比較。他們認為這次運動不像野百合學運那樣只容許大學生進入、區隔學生和一般市民。然而我認為，稱讚今日的「學生」比過去更有開放性，這是有問題的。更進一步來說，三月的運動至今被視為「學生運動」，本身就需要被批判和反思。

三月運動的導火線是將與中國大陸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關注相關議題的社運團體，過去一年來，一直在政府機關內外進行抗爭。這和日本或歐洲談學運，往往不只因為「學生」參與，也因為是「校園內的抗爭」，兩者非常不同。人們意外衝進立法院的

第一天，許多成員根本不是學生。佔領成功的消息釋出以後，各方人馬的集結和聲援，當然包括很多年輕人、包括從國中生至大學生，也包含有較高動員能力的社運組織。但是接下來幾天在會場內的角力，大致底定了整個運動以部分社運組織、個別學生、幾個學生組織為內部決策單位，以「青年學子」為對外呈現的表面，這一種詮釋模式。其後迅速被媒體和輿論再現為學生運動，並且連結到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也就不太令人意外了。

然而，像服務貿易協定這樣與經濟、勞動攸關的問題，缺乏左翼或勞工的參與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當整個運動被定調為學運，配合著「學運」符碼在台灣總是扣連著爭取民主體制，運動也就成為「反對黑箱操作」的「民主運動」，一些人在議場內掛起「反對自由貿易」的布條也被撤下。「左翼」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我認為相當令人失望。雖然有一些工運組織的成員也長時在立法院外圍集結，但他們也沒有把焦點拉回勞動鬥爭的問題，而把焦點放在運動進行中的權力分布，批評「學生」和少數NGO過於中央集權，主導整個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只有像勞動人權協會是以勞動問題為核心，公開介入這場運動，雖然是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場，批判大部分的運動訴求。

柄谷先生提出，不要再頑固地區分勞工、市民或學生這些身分，而應該看到學生也可以是作為勞工在戰鬥，特別是校園已經是進行勞動抗爭的今天，台灣大學校園的狀況也是這樣的。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啟發性的觀點。但從台灣三月運動的例子，我想說明的是，有別與柄谷先生關注從大學校園內出發的學生運動，如何能開啓更多可能，台灣的「學運」反而是一個逆向的，將一個本來就攸關經濟和勞動問題、參與者也不只是學生的運動，轉化成「學運」。對於這種身分的跨越與轉換，柄谷先生從日本的經驗提出，「站在有利的位置就好了」，我想從以上的經驗繼續追問，各方勢力基於不同的訴求和立場，驅動了人們要站在哪個位置，因為某些位置確實讓特定訴求比較容易推動，例如「學運」的位置促成了「民主程序」訴求的出線。台灣的運動經驗可以說

是這種角力結果的體現。而這種角力和鬥爭當中，有所謂共同的「有利的位置」嗎？柄谷先生也提到，在日本的語境中，「學運」常常是被捨棄、運動不願意稱做自己是學運的。這種語境下設想「有利的戰鬥位置」，和台灣的運動者常常會設想「有利的輿論位置」，兩者怎麼區別呢？

柄谷：

雖然聽了廖欽彬先生現場口譯的說明，但我沒有自信能充分理解你的問題。今天我所談的內容是從日本如何看待台灣的運動開始。事實上，在日本確實沒有像台灣這樣的學生運動。韓國也有學生運動，但日本沒有。我認為這和學生運動長期以來擔負的角色與意義有關。誠如剛才提到的，在台灣和韓國的「學生運動」與「國家」(nation)或「民族」類似，其中帶有正面的意涵。但是，在日本，這三十年間「學生運動」完全是負面形象。六十年代以降的二十年間，新左翼之間只有互相廝殺，而且不只是廝殺，甚至還大肆宣傳廝殺的事蹟。這類事情聽了二十年，任誰都會產生反感。因此近年的社會運動必須不斷切割這種對學生運動的記憶、必須不斷表現自己並不是那種學生運動，直到現在大家還是不斷重複「我們和那種學生運動無關」。所以，國會前的抗爭還得掃地，並且告訴世人「我們是和平抗爭」。這背後反映的是人們對學生運動的負面印象依舊根深柢固。因此就算真的是學生發動的學生運動，也必須偽裝成不是學生運動。聽起來在台灣似乎正好相反，雖然是勞工運動，弄得看起來像是學生運動，反而更好，韓國也是如此，這是由於有關學生運動的記憶都是正面的關係，但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勞工運動的形象或記憶比較負面。

這種歷史上的差異，造成即使是同樣的語彙也有不同意涵，沒辦法只從語彙去理解學生運動。因此我想問題不是學生運動該如何，而是勞工運動該如何。不是只有日本，一般來說90年代之後的勞工運動壓倒性地貧弱。在我的想法中，能夠對抗這種狀況的運動就是“NAM”。雖說勞工運動是必要的，但做不到也無可奈何。台灣可能沒有這類情況。不過在日本，無論是安保 爭或

其他社會運動，一旦遭遇挫敗，總是會出現「正因為是學生運動所以失敗」，或者「不靠勞工運動不行啊」這類反省與批判。在台灣也許不會出現此類情況，但剛剛提出來的討論，認為「學生運動不行，一定要是勞工運動」的這個想法上有點類似。

我想說的是，現在已經沒辦法繼續維持過去那種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之間的區別。我在1960年代參加抗爭時，抗爭現場有警方的廣播車對抗爭群眾廣播，廣播像「停止抗爭」或者當抗爭群眾蛇行前進（ジグザグデモ）時說「不要蛇行前進」之類的警告，其中讓我驚訝的廣播是這麼說：「就讀最高學府的學生諸君！」各位能明白嗎？當警察的不會去念最高學府啊！剛剛提到日本大學的例子，當時的日本大學幾乎沒有入學考試。在1968年以前日本大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犯罪事件，如果有什麼大學生恐嚇事件發生，絕對有日本大學的學生參與。當然現在已經不同。日本大學改變的契機是1968的「日大鬪爭」，在那之後才多少看起來像一間大學，大學反而應該感謝學生運動。60年代的學生實際上是少數，所謂的「菁英」就是指稱這些少數的學生。擺架子高高在上的並不是菁英，對世事抱持疑問的人才是菁英，絕對不可能有保守的菁英，菁英絕對是左派的！1920、30年代左右的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幾乎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威脅，並不是因為共產主義者令人恐懼，而是因為自己的後繼者全部赤化，因此他們必須導正這些學生。但如果只是全面鎮壓的話，就沒有後繼者了，因此當時花了许多心力讓他們轉向。戰後的自民黨包括成為首相的人，像福田赳夫，原本都是左翼學生。我想說的是，當時身為菁英、左翼的學生曾經扮演重要角色。台灣或許曾經也是如此，不過現在情況已經不同。日本的學生運動負面印象太強，人們既然正面看待台灣學生運動，我認為這沒什麼不好。在我的想法中，我認為並不存在學生和勞工的分別，我到現在也仍舊自稱學生，沒有工作、每天都在讀書，也只能是學生。所以我做的事就是學生運動。無論是學生還是勞動者，只要行事方便就好！

另外剛才也稍微提到勞工運動和消費者運動，日本最大的環境問題當屬「水俣病」，是一家叫「新日本窒素肥料」的公司將有機水銀排放到海裡造成的環境公害。當時的人們開始懷疑是不是該公司造成時，該公司否定這些指控，並收買大學等為其背書，這大概持續了二十年。由於有遭解僱的憂慮，工會和公司的立場是一致的，發動抗爭的其實是勞工的家人、是主婦們。對他們來說，食物是發病的原因，他們是受害者，雖然勞工和公司立場一致，但主婦們卻站在反對立場。因此，人們把「主婦的運動」稱為「消費者運動」，確實正是如此，畢竟工會是支持公司的。然而「消費者」不是勞工嗎？他們是勞工的家人啊！因為不能以勞工的身份發動運動，所以才用消費者的身份不是嗎？因此我認為那就是勞工運動，雖然看起來是消費者運動，實際上正是勞工運動，只不過是因為從勞工的身份行動有困難罷了。

所以剛剛說不得不裝成學生的樣子，那並無不妥，畢竟不可能永遠都是學生，總有一天會成為勞工，只不過在那之前就開始行動罷了，因此那也是勞工運動，不是嗎？雖然總是有「左翼」之類的稱呼，我認為不能拘泥於那種形式。另外，剛剛也提到工會運動，我稱之為「內在的抵抗運動」。政治鬥爭也是一種內在的鬥爭，與此類運動不同、我稱為超越的鬥爭，諸如合作社、地方貨幣等。雖然不是直接進行鬥爭，實際上卻形成一種非資本主義式的社會基礎。這兩者雖然不同，卻有所關連，比方說韓國在兩年前頒布合作社法，還不到兩年，韓國就已經成立超過四千個合作社，只要有五人就可以成立合作社，在日本幾乎不可能。所以說要如何改變現狀，首先必須修正法律。從這點來看，內在的鬥爭也是必要的，或者應該說，兩種鬥爭都是必要的。然而，和政府的斡旋最後都變成要求政府給予更高金額的救濟，所以這兩種運動之間必須要有所連結。這也是為何我會關注武井昭夫的學生運動論，他不僅在全日本的大學中創立自治會，同時也成立合作社；換句話說，他不只是談學生運動，實際上也談合作社，而且兩種運動同時進行。雖然現在我關注武井，也給予高度評價，但

在日本從來沒有人談論。雖然我不太清楚台灣的情況，不妨參考一下我所提到的各種可能性。

卜憲鵬（交通大學人社系三年級）：

我的問題有點寬鬆，但是比較直接進入政治性的問題就是，我想既然您講的是戰後日本左翼，那您可不可以解釋五五年體制這個問題，就是日本戰後長期是以自民黨獨大的，社會黨作為一半的在野黨的這個一又二分之一的政黨制。可是，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左翼在很多方面是具有社會力的，可是為什麼在最後表現出來的反應和力量是微弱的，而長期是處於在野的狀態？

呂竟（交通大學人社系四年級）：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柄谷教授您對沖繩獨立運動的看法。另外，不知道柄谷教授知不知道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脈絡？我想請問的是這些要求從殖民狀態解放的運動是不是和模式D的association一樣，就是一個還沒有到來的，要去追尋的狀態？還是柄谷教授會認為在現在這個狀態還在談民族是很落伍的，因為是要取消民族、超越國家的。

柄谷：

我要把問題統整起來回應，可能有一些問題無法在此處回答。首先，針對帝國主義，我有自己的思考，和其他人的談論方式有所不同。關於帝國主義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我想基本上可以視之為霸權國家消失的狀態，比方說十九世紀的霸權國家英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沒落後，各個國家為了取而代之而產生競爭，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國和美國，接著則有日本和俄國，爾後發生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戰爭，最後則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讓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美國的霸權持續到二十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看起來美蘇對立體制，這是騙人的，實際上是美國支配體制，那個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時代正是美國霸權的時代，而其開始沒落則是在1980年代左右。然後則是被稱為全球化的時代，也同時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時代。然而與其

說是新自由主義，實際上無疑是新帝國主義時代，完全不是自由主義。目前正處於競逐下一個霸權國家的時代。在面對當下的狀況時，我們不能看戰前，而必須將目光放到一百二十年前，而能從中能發現非常類似的因素。下一個霸權國家毫無疑問地會是中國。對此，日本和美國攜手合作與之競爭。我認為對於當下是帝國主義的時代這一點要有所認識。

另外一個問題提到「民族」是否落伍。我並沒有這麼說。我想，現在仍舊存在「民族」是具有正面意義的情況，沒辦法只從語彙去判斷。我不覺得舊的東西就是不好，問題在於舊的東西的回歸。比方說，大家都認為未來會有「沒有國家的社會」，但是沒有國家的社會以前就存在。好比台灣在荷蘭來之前，大概就是沒有國家的社會。我曾經討論過希臘和愛奧尼亞，愛奧尼亞是由希臘移民所建立的社會，希臘所有重要的元素都是由愛奧尼亞的殖民者所建立的。談到希臘就會想到哲學家，這點在根本上也是來自愛奧尼亞。在某種意義上，蘇格拉底是把愛奧尼亞的哲學帶進希臘，但是蘇格拉底並不知道愛奧尼亞。我不覺得參與太陽花運動的人有回顧過去，但我看起就是過去的回歸。一般來說，人們有意識地回顧過去，只會去想一些無聊的事，所謂的歷史，歷史學的歷史，就是國家創造的東西。在國家不存在的階段，歷史並未被書寫，但這並不是野蠻、未開化，事實上是先進的，因為沒有愚蠢的國家戰爭，也沒有貧富差距。這不是很值得學習嗎？所以所謂舊的東西，在意義上有所不同。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我們的確聽到了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柄谷先生剛才的回應中，說明了關於水源汙染、環境汙染、食物安全的問題，每一個角落感受到這個問題，而不得不出來抵制。這個抵制的力量就不會跟學生、勞工或是消費者有所區隔，而是一個自由聯盟的運動。就是在這個時候，大家都會對自己身邊的不合理狀況有所不滿，並且站出來。這似乎也就是他在說的D的降臨；也就是說，被壓抑者的復返。它不是一個突然冒出來的一個神諭，而是說不得不

出現的行動，或是無法出現的思想開始出現。這就是柄谷行人不斷講的D的概念。顯然他不是講宗教或是神明，而是在講他所說的合作社的、平等交換的小社群。這個小的社群會抵制被國家或者資本結構的控制。不管是民族或者民族國家，都容易會進入資本邏輯和國家結構。柄谷行人似乎在說，一個沒有國家資本結構的社會，反而是可以進行無支配性的自由平等交換的小社會模式。那麼，如何可能有一個抵制資本和抵制國家的共同體可以自由的連結並且形成呢？這些就是柄谷行人的演講帶給我們的思考。